

西部欠发达地区能源开发利用与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以陕西省延安市为例

张永凯, 张楠

(兰州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以陕西省延安市为研究对象, 根据研究区煤炭、油气等能源的开发现状, 分析欠发达地区能源利用中存在的集群效应差、产业链条短、生态破坏严重和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 能源开发; 经济; 环境; 协调发展; 延安市

中图分类号: X382, X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 8141(2013) 01- 0056- 05

Study on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Energy Utilizatio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Less Developed Western Regions ——A Case of Yan'an City in Shanxi Province

ZHANG Yong-kai, ZHANG Nan

(School of Agriculture & 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took Yan'an City as typical example, and analyzed some problems of energy exploration in the less-development region, such as poor cluster effect, short industrial chain, serious ecological damage, inadequate benefits distribution mechanisms and so on. Finally, counte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Key words: energy exploration; economy; environment; harmonious development; Yan'an City

自然资源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 然而由于人类在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盲目性和短视行为, 导致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现象较严重, 加剧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我国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 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能源开发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 加之环境保护措施不当, 产生了许多环境问题, 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陕西省延安市作为我国重要的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 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但能源资源丰富,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属于典型的资源型欠发达地区。长期以来, 国家和陕西省都十分重视延安革命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和倾斜政策。在新的形势下, 为了振兴老区, 2012年国务院批复了《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 旨在推动延安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本文以革命老区延安市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煤炭、油气等能源开发与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分析, 揭示资源型欠发达地域发展的特质和规律, 探讨延安市能源开发利用和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关系, 为资源型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收稿日期: 2012- 11- 17; 修订日期: 2012- 12- 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编号: 10XJY0028); 2011年度甘肃省教育厅第二批科研项目(编号: 1105B- 06)阶段性研究成果。

第一作者简介: 张永凯(1974-), 男, 甘肃省环县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规划。

1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关于自然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是经济学家长期争论的一个主题。早期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 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条件。但后来一些资源丰裕型国家或地区出现了经济衰退现象, 导致“资源是经济增长引擎”的观点受到了质疑。Auty在研究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首先提出了“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的假说^[1], 并由此掀起了“资源诅咒”的研究热潮。

随后, 学者们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验证, 结果出现了3种不同的研究结论: ①“资源诅咒”存在论, 即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但没有促进经济增长, 反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2- 5]。②“资源诅咒”颠覆论, 即自然资源并非是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 主要是制度层面造成的后果^[6- 8]。③“资源诅咒”条件论, 即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正、负影响作用是有条件的, 由于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资源类型制度体系等差异^[9- 11], 研究结论出现偏差。在“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中, 近年来“荷兰病”(Dutch disease)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Egert和Cleard认为, 石油价格和收益的上升, 通过汇率升值限制了哈萨克斯坦非石油制造业的发展, 导致“荷兰病”的产生^[12]。Pegg认为, 博茨瓦纳尽管具有较高的人均GDP增长率, 但是其经济的多元化并不成功, 同样也出现了“荷兰病”的许多症状^[13]。国内学者对“资源诅咒”问题的

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徐康宁提出中国区域的经济增长在长周期上也存在着“资源诅咒”效应的假说,它是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14]。徐康宁、王剑以我国的省际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区域内部同样存在“资源诅咒”假说,多数省份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15]。邵帅、齐中英通过省际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能源开发确实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16]。总之,学术界关于自然资源与经济的关系尚未达成共识,两者之间的内在机制值得深入探讨。

国内对欠发达地区开发的实践比较重视,但是关于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学术研究相对滞后。虽然有不少关于国土规划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报道,但是囿于条件所限,大多数文献未能对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结构、功能、机制和模式等进行深入研究,缺乏大量资料和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和较高水平的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黄土高原综考队研究了黄土高原的综合治理与开发,提出黄土高原“治理与开发相结合,以开发促治理,以治理保开发”的方针,采取“适度倾斜、总体协调、稳步发展”的总体战略,倾斜的重点是以水土流失为中心的环境治理和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然而,这些研究未能深入揭示空间结构二重性、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等资源型欠发达地区的深层次问题。厉以宁等经济学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协调问题,因此对欠发达地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必须施加一个外在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当地政府^[17]。

马江认为,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具体途径^[18]。李志刚指出,陕甘宁接壤区能源、矿产资源丰富,但区域经济十分落后,二元结构问题突出,生态严重失调,发展战略要与贯彻国家目标、区域利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19]。李志刚同时认为,陕甘宁接壤区具有建设能源重化工基地的资源基础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应着眼于培养产业竞争优势,及早延伸产业链,积极培育多元化产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20]。韩芳、王旭、张风丽指出,油气资源开发确实带动了新疆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21]。胡健、焦兵以陕西省为例,分析了资源富集区油气资源开发对中国西部区域经济的拉动效应,结果表明油气资源开发虽然对当

地具有一定的拉动效应,但是油气资源开发也与当地经济发展脱节,需要改革西部油气资源开发产业布局,完善油气资源产业链条^[22]。刘刚、沈镭等以陕西省榆林市为例,分析了资源富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互动作用,认为新兴资源型城市和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两大特点决定了榆林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性^[23]。

2 研究区概况及能源开发利用现状

延安市位于陕西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北接榆林市,南连咸阳市、铜川市、渭南市,东隔黄河与山西省临汾市、吕梁市相望,西依子午岭与甘肃省庆阳市为邻,下辖宝塔区、黄陵县、黄龙县、宜川县、洛川县、富县、甘泉县、吴起县、志丹县、安塞县、子长县、延川县和延长县13个县163个乡镇。截至目前,延安市的总人口为212.0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58.5万人。延安市是我国的能源重地,境内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储量较丰富,具有分布面积广、易开采等特点,已探明煤炭储量115亿t、石油13.8亿t、天然气2000—3000亿m³、紫砂陶土5000多万t。延安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大陆第一口油井位于延安市延长县,石油开发已有百余年历史,境内石油资源集中分布在以延长油矿管理局为中心的北部油区和吴旗、志丹、富县、安塞及甘泉等油区,原油具有含硫低、粘度低、比重低、轻质油含量高的优势。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子长、黄陵和延安三大煤区,延安地区的煤炭资源具有储量大、煤质好、埋藏浅的明显特点。目前,石油、煤炭工业已成为延安市的支柱产业。

从历年延安市原煤和原油能源产品的产量来看,1991—2010年持续上升,发展势头强劲(表1)。截至2009年末,延安市共有能源企业202户,其中煤炭企业136户、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企业63户、原油加工企业3户。2009年延安市原煤产量2029.92万t、原油产量1514.06万t、原油加工量964.65万t,当年实现财政总收入263.14亿元,地方财政收入90.47亿元,其中能源工业在GDP中占的比重为67.93%^[24]。由此可见,能源产业已经成为推动延安市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局面。

从能源的贡献度进一步分析可见,石油和煤炭工业在延安市整个工业体系中占据绝对的压倒性优势。1991—2010年,能源工业产值在延安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加大。其中,煤炭产业所占的比重虽然产生波动,但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而石油产业所占的比重基本上呈持续增长趋势,且在整体工业总产值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表2)。由此可见,延安市是典型的能源

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

表1 延安市主要能源产品历年产量

年份	原煤(万t)	原油(万t)	年份	原煤(万t)	原油(万t)
1991	528.58	85.02	2001	358.97	314.33
1992	551.11	101.35	2002	631.48	570.62
1993	641.35	113.67	2003	885.03	691.72
1994	559.00	122.08	2004	1000.89	898.63
1995	630.66	151.33	2005	1068.66	1058.57
1996	640.61	191.04	2006	696.68	1180.32
1997	665.59	254.19	2007	1084.83	1333.37
1998	627.56	274.78	2008	1416.88	1410.85
1999	466.75	161.11	2009	2029.92	1514.06
2000	469.25	213.56	2010	2559.93	1602.01

注:资料来源于历年的《延安统计年鉴》。

表2 延安市能源工业产值及其比重

年份	煤炭工业产值	所占比例	石油工业产值	所占比例	能源工业总比例	工业总产值
1982	0.28	0.139	0.41	0.204	0.353	2.0117
1983	0.14	0.061	0.49	0.213	0.296	2.2953
1984	0.22	0.082	0.62	0.232	0.340	2.6739
1985	0.43	0.129	0.59	0.177	0.336	3.3340
1986	0.48	0.118	0.71	0.175	0.320	4.0594
1987	0.36	0.072	1.05	0.211	0.309	4.9881
1988	0.45	0.063	2.18	0.304	0.388	7.1823
1989	0.68	0.058	5.39	0.461	0.532	11.7026
1990	0.86	0.061	7.53	0.532	0.605	14.1458
1991	0.94	0.052	10.51	0.582	0.648	18.0529
1992	1.07	0.048	13.17	0.591	0.658	22.2933
1993	1.03	0.030	22.84	0.665	0.714	34.3698
1994	1.25	0.032	15.27	0.385	0.445	39.6173
1995	1.43	0.032	30.89	0.702	0.763	44.0170
1996	2.24	0.037	42.73	0.707	0.768	60.4142
1997	2.72	0.034	61.21	0.760	0.811	80.5304
1998	1.13	0.014	61.33	0.784	0.817	78.2137
1999	0.84	0.012	58.5	0.803	0.837	72.8561
2000	1.80	0.013	101.25	0.746	0.772	135.7493
2001	1.13	0.007	126.13	0.761	0.780	165.6679
2002	3.55	0.018	142.54	0.736	0.768	193.5653
2003	5.80	0.022	201.59	0.750	0.781	268.9218
2004	11.24	0.032	259.31	0.735	0.776	352.7953
2005	16.12	0.030	472.53	0.871	0.914	542.7113
2006	18.85	0.024	662.85	0.860	0.895	771.0532
2007	28.18	0.031	787.29	0.864	0.912	911.2564
2008	62.05	0.056	935.86	0.846	0.918	1106.6030
2009	99.22	0.101	799.99	0.811	0.936	986.1600
2010	126.39	0.100	1020.48	0.807	0.933	1263.972

注:根据《延安统计年鉴》计算所得。工业产值单位为亿元,所占比例单位为%,能源工业包含了电力工业。

3 能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3.1 能源产业集群效应不明显

延安市资源型经济的特点是“点多、线长、面广”,产业集群效应差,目前没有形成具有综合效用的核心产业,尤其是作为经济增长点的生产、科研、商贸中心没有形成。延安市的石化产业正处于发展的中初期,

长庆油田(中央企业)和延长石油集团公司(省属企业)各自为政,中央直属企业与地方工业直接的产业联系不紧密,分工的专业化和协作的社会化不够^[25],直接影响到资源型企业集群效应的发挥。延安市能源产业链条短,大量石油廉价外销,深加工能力差、产品附加值低、吸纳劳动力有限,强大的资源优势尚未完全转化为明显的经济优势。

3.2 能源空间分布不均衡

总体上看,延安市煤炭和油气资源非常丰富,但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不均衡现象,这也直接影响到区域内各区县的经济水平。宝塔区、延长县、子长县、安塞县、志丹县、洛川县的石油资源丰富,黄陵县煤炭资源储量较大,经济实力相对较强,而黄龙县、宜川县、延川县和富县的石油资源相对较少,经济实力相对薄弱,导致各县区的经济差距拉大(表3)。从表3可见,煤炭和石油资源丰富的县区其国民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地方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都相对较高,而能源短缺的县区经济实力相对薄弱,区域经济差距悬殊,这直接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表3 2010年延安市分县区能源和国民经济统计指标

县区	国民生产总值(万元)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万元)	原油/原煤产量(万t)	地方财政收入(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宝塔区	1463849	961216	179.34	85312	5051
延长县	254792	141452	56.34	25686	4258
延川县	650531	1616813	9.51	18420	4002
子长县	594395	554255	98.92	84199	5050
安塞县	722392	700419	66.51	77830	5562
志丹县	138637	1491077	231.73	154516	5116
吴旗县	1209295	1585471	212.50	181108	5298
甘泉县	205999	227655	49.40	39456	5301
富县	198948	67673	18.08	11793	5497
洛川县	1281527	3918686	654.41	14876	6852
宜川县	132430	9149	2.00	6180	5104
黄龙县	63451	256	-	1295	4570
黄陵县	698978	99692	2257.41	188086	6130

注:资料来源于2010年《延安统计年鉴》;黄陵县为原煤产量,其余各县区均为原油产量(其中黄龙县的原油产量数据缺失),原油产量不包括长庆油田在内。

3.3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伴随着延安市石油和煤炭等资源开发的不断扩大,以石油、煤炭为主的工业污染对环境的影响加重,造成了地表水断流、地下水位下降、水质恶化、地面塌陷、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延安市(除洛川、黄陵、黄龙等县外)有石油开采活动,境内分布着长庆、江汉、中原油田公司和延长石油集团的29562个井场、62190口油井、4332.8km输油管线、171座集输站(输油站),大规模的石油资源开发导致流域水资源短缺和水质下降,目前延安市的河流等于或优于III类的河水仅有474km,境内2/3的河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26]。煤

炭资源主要集中分布在子长县、黄陵县、宝塔区、富县和延长县,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导致地面塌陷,植被破坏现象较严重。

3.4 利益分配机制欠完善

在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必然涉及各主体的切身利益,因此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能源开发与区域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依据能源开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过程中各方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共享,需要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居民、政府与居民等主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得到补偿的居民和未得到补偿的居民等主体层次之间的关系。根据陕西省政府1998年与中石油签订的“4.13”协议商定:“长庆油田在勘探开发石油资源过程中,要兼顾地方利益,促进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合作开发石油资源,以油养油,滚动发展”。就延安的实际情况而言,目前主要是代表中央企业的长庆油田和省属企业的延长石油集团公司,两者在利益导向上出现偏差,中央企业不顾地方发展规划,从地方廉价地输出一性能源产品,对地方就业和经济发展贡献小。此外,在能源开发过程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但受补偿机制的影响,当地居民从中获得的补偿数额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能源开发对当地居民增收致富的带动作用。

4 能源合理开发利用和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对策

4.1 加大能源技术研发,延长产业链条

针对延安市目前传统的采油、采煤以及单纯生产燃料油品的生产方式,有必要建立能源技术研发基地,通过企业、科研机构 and 大学之间产学研联盟的建立,整合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协同发展模式,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创新体系,提高研发创新能力,为能源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同时,针对延安市石油和煤炭产业链条短的现状,需要把以石油化工和煤化工为主的产业做大做强,将部分燃料油品进行石油化工深加工,实施煤液化和气化工程,延长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石油和煤炭化工产业向集约化、高级化、系列化和深加工方向发展,进一步提高能源化工产品的附加值。

4.2 加强环境保护与治理,提高能源利用综合效益

延安市地处生态环境脆弱区,水资源严重短缺。从能源开发战略考虑,一定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走“保护与开发并重”的道路,把能源开发、环境保护同地方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给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要坚持“谁开发谁治理,谁破坏谁补偿”的方针,根据资源开发对环境

的破坏程度,建立资源开发方对当地各利益主体方的生态补偿机制。就石油工业发展而言,污染防治要从终端控制为主向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从分散治理向分散与集中相结合转变,从点源治理向区域综合治理转变,在资源型企业中积极推进清洁生产。同时,要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科技手段,制止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27],提高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4.3 推进资源税改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随着我国资源税改革从新疆的试点开始,继而逐步全面推行,主要的变化是部分品种资源税由从量计征变为从价计征,并提高部分高价稀缺资源的征税标准。资源税改革对完善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引导经济结构调整、缓解中西部地区财力紧张都具有重要意义。延安市要紧紧抓住资源税改革的有利时机,积极探索油气资源“从量计征”逐步转向“从价计征”的实践,不断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增强地方经济实力,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真正实现富民强市,促进资源型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4.4 制定能源产业发展规划,促进地区经济转型

由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的耗竭性,随着资源的开发,资源型地区一般要经历兴起期、丰裕期、衰退期和枯竭期的生命周期。因此,对延安市这样一个资源型欠发达地区而言,一定要未雨绸缪,根据目前的煤炭、油气资源储量和环境承载力,提早制定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研究未来经济转型的途径和方向,在能源开发过程中处理好能源产业和非能源产业之间、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建立能源开发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机制,规避能源枯竭后出现经济衰退和环境恶化。

参考文献:

- [1] Auty R.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 [M]. London: Routledge, 1993.
- [2] Sachs J D, Warner A M.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J]. NBER Working Paper, 1995, 5398: 1-36.
- [3] Papyrakis E, Gerlagh R. 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and Its Transmission Channel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4, 32(1): 181-193.
- [4] Arezki R, Ploeg F V. Can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be Turned into a Blessing? The Role of Trade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J]. IMF Working Paper, 2007, (55): 1-24.
- [5] Collier P, Goderis B. Commodity Prices, Growth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Reconciling a Conundrum [J]. MPRA Paper, 2009, 17315: 1-28.
- [6] Davis G A. Learning to Love the Dutch Disease: Evidence from the Mineral Economies [J]. World Development, 1995, 23(10): 1765-1779.
- [7] Manzano O, Rigolon R. Resource Curse or Debt Overhang? [J]. NBER Working Paper, 2001, 8390: 1-36.
- [8] Lederman D, Maloney W F. In Search of the Missing Resource Curse [J].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8, 4766: 1-24.

[9] Ding N, Field B C.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J]. Land Economics, 2005, 81(4): 496- 502.

[10] Sala - I - Martin X, Subramanian A. Addressing the Natural Resource Curse: An Illustration from Nigeria[J]. NBER Working Paper, 2003, 9804 2- 46.

[11] Wen M, King S P. Push or Pu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Trade and Primary Resource Endow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4, 53(4): 569- 591.

[12] Egeit Bal zs, Carol S Leonard. Dutch Disease Scare in Kazakhstan: Is It Real? [J]. Open Economies Review, 2008, 19(2): 1- 25.

[13] Pegg Cott. Is There a Dutch Disease in Botswana? [J]. Resources Policy, 2010, 35(1): 14- 19.

[14] 徐康宁, 韩剑. 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 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J]. 经济学家, 2005, (6): 96- 102.

[15] 徐康宁, 王剑. 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J]. 经济研究, 2006, (1): 78- 89.

[16] 邵帅, 齐中英. 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 2008, (4): 147- 160.

[17] 厉以宁, 章铮. 环境经济学[M].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5.

[18] 马江. 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19] 李志刚. 陕甘宁接壤区的区域发展——典型资源型欠发达地区发展战略研究[J]. 地理科学, 2000, 20(2): 139- 143.

[20] 李志刚, 张锦宗, 薛丽芳. 陕甘宁接壤区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构想[J]. 地理研究, 2002, 21(3): 287- 293.

[21] 韩芳, 王旭, 张风丽. 开发油气资源对新疆经济的带动作用[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05, 21(3): 225- 227.

[22] 胡健, 焦兵. 油气资源开发对中国西部区域经济的拉动效应分析——以陕西省为例[J]. 资源科学, 2007, 29(1): 2- 7.

[23] 刘刚, 沈镭, 等. 资源富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互动作用初探——以陕西省榆林市为例[J]. 资源科学, 2007, 29(4): 18- 24.

[24] 延安统计年鉴编辑委员会. 延安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25] 苏永乐. 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制度创新——以延安市为例[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06, 19(6): 26- 29.

[26] 刘育红, 张强. 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问题研究——基于延安市的调研数据[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0, 23(6): 23- 27.

[27] 潘新华. 延安石油工业发展战略的思考[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26(3): 92- 94.

(上接第 43 页)

—东南部高、东部低”的分布格局。合作市作为全州的行政、经济、文化、金融中心,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仍为全州最高; 西南部的玛曲县和碌曲县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高, 发展持续性较为稳定; 迭部县、夏河县、舟曲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使甘南州西北部、东南部的区域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有一个整体的提升; 临潭县和卓尼县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的变化, 仍处于经济发展低水平阶段, 导致东部区域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低。2010 年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高、较高、低、较低 4 种分类的县域数量比为 1: 3: 3: 1, 呈“两头小, 中间大”的橄榄球型。运用集中指数测度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程度, 得知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指数由 2001 年的 0.135 下降到 2010 年的 0.132, 表明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程度在降低, 县域经济空间极化趋势降低, 均衡发展强化, 这一结果与人均 GDP 集中指数测算甘南州整体县域经济空间集中程度的结果基本一致。

5 结论

运用泰尔指数、集中指数和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对甘南州县域经济空间差异、集中程度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综合评价, 结果表明: ① 2001—2010 年甘南州区域经济差异逐渐减小, 经济发展集中程度降低。②近 10 年来, 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升降不一, 合作市、舟曲县、迭部县及夏河县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其中舟曲县和迭部县提升幅度较大, 临潭县、卓尼县、玛曲县和碌曲县经济发展水平下降, 全下降幅度较小; 在甘南州区域整体发展水平上,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增多, 经济发展水平从 2001—2010 年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区域经济发展趋于均衡。

参考文献:

[1] 中国县域经济 2002[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3 8.

[2] 胡灿伟. 中部崛起背景下湖北县域经济组团发展研究[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6.

[3] 姜玲, 荣秋艳. 中国县域经济的研究评述[J]. 经济问题探索, 2012, (5): 79- 84.

[4] 李玲. 湖南县域经济的评价与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09, (8): 87- 88.

[5] 赵玉芝, 董平. 江西省县域经济差异特征及其成因分析[J]. 人文地理, 2012, (1): 87- 91.

[6] 李小建, 乔家君.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县际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J]. 地理学报, 2001, 56(2): 136- 145.

[7] 彭宝玉, 覃成林. 河南县域经济实力评价及空间差异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7, 26(1): 45- 48.

[8] 桑秋, 张平宇, 高晓娜, 等. 辽中城市群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分析[J]. 地理科学, 2008, 28(2): 150- 155.

[9] 欧向军. 江苏省县域经济差异演变的结构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5, 24(2): 25- 29.

[10] 钟业喜, 陆玉麒. 长三角经济圈县域经济差异研究经济地理[J]. 2010, 30(4): 568- 573.

[11] 高云虹, 王美昌. 省际边缘区县域经济差异及其空间特征分析——以赣州市为例[J]. 经济地理, 2011, 32(5): 736- 740.

[12] 向云波, 张勇, 袁开国, 等. 湘江流域县域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及特征分析[J]. 经济地理, 2011, 31(7): 1088- 1093.

[13] 黄明辉. 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以贵州省黔南州为例[J]. 特区经济, 2012, (5): 261- 263.

[14] 廖乐焕.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3.

[15] 陈明星, 陆大道, 张华.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J]. 地理学报, 2009, 64(4): 387- 398.